

普列漢諾夫著

雪 峯 譯

藝術與社會生活

世界名著譯叢
生活書店發行

四之叢譯著名界世

活生會社與術藝

著夫諾漢列普

譯 峯 雪

上海活生書店發售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



四之譯著世界
活生會社與藝術

每冊實價銀三角
外埠加費

著者 G. V. Plekhanow
譯者 雪峯
發行者
印刷者
生活书店
上 海 福 州 路
第三八四號

版權所有印翻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初版

三版改譯本序

這一個小冊，初譯成中文出第一版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，係根據藏原惟人的日譯重譯，曾編入當時的「科學的藝術論叢書」中。蒲力汗諾夫的原作，則初為一九一二年十月在巴黎及列日進行的演講，後經改作發表於「近代人」雜誌一九一二年第十一號，十二號及一九一三年第一號上，今已收在全集第十四卷裏。我的譯本曾經再版，但近來重讀一過，覺得譯文有生澀及不妥之處，現即改譯數處及更動字句甚多，重出版，以謝讀者。至於原著見解中之可議者，本想不自量力，試附以指明的，但想到我國學術思想界亦已略能識別，茲不再贅。

譯者 一九三七年十月。

序

現在想在這裏請讀者注意的這著作，是將本年十月我在列日及巴黎用俄國語朗讀的那「報告」改作成的東西。因此，在本篇裏就留着一些朗讀的體裁。在第二章的煞尾，我將盧那卡爾斯基（A. Lunacharsky）氏在巴黎公開對我表示的關於美的標準的問題的那反駁，下了檢討。那時我曾在口頭上辯答過了，但現在付印時在這問題上停留一下，我以為有益的。

著者 一九一二年

關於藝術和社會生活的關係的問題，在一切有某種程度的發達的文學上，都會盡了非常重要的任務。而且這問題常常在兩種完全對立的意義上被解決着，正在被解决着。

有些人會說，現在也還在說——人並不是爲了土曜日而存在，是土曜日爲了人而存在的。社會並不是爲了藝術家而存在，却是藝術家爲了社會起見纔存在的。藝術非幫助人類意識的發達，社會構造的改善不可。

另一些人却決定地反對這見解。據他們的意見，則藝術，牠本身就是目的。他們說：無論藝術是怎樣高尚的東西，倘若當作達到某種別的目的的手段而使用牠，是使藝術作品的價值降低了。

這二種見解的第一種，在六十年代的我們的前驅的文學中，能看出牠的分明的反映。例如皮沙列夫(Pisoreff)就執着那極端的一面性，竟將牠發展到Caricature(漫畫)的程度，是不必說的了；我們還能夠舉出在當時的批評上的這見解的最根本的擁護者——車勒芮綏夫司基(Chernyshevsky)和陀布洛留僕夫(Dobrolioubov)來。

車勒芮綏夫司基在他的最初的評論之一裏這樣寫着——

『「爲藝術而藝術」在我們的時代是和說「爲了富而富」，「爲科學而科學」等等，同樣奇怪的思想。人類一切的事業，要使牠不變成空虛的無用的東西，就非服務於人類的利益不可。就是富是爲了人們要使用牠而存在，科學是爲了做人們的指南針而存在的；藝術也不是爲了無用的滿足而存在，牠非爲了某種本質的利益而服務不可。』依車勒芮綏夫司基的意見，則藝術——尤其那「最嚴格的藝術」的詩歌的意義，是看牠普及在社會之中的廣大的知識而決定的。他說道——『藝術，正確地說來是詩歌(只有詩歌，因爲別的藝術在這意義上並不重要)使非常多的知識擴張在讀者大衆之

中，更其重要的事情是使那依據科學而成的理解普及着，——這是詩歌對於生活的偉大的意義。」（註一）在他有名的學位論文「藝術對於現實的美學的關係」中，也有和這相同的思想。照他的十七個提要（Thèse）說來，則藝術不僅是再現生活，並說明生活。那作品是常常「有着關於生活現象的判決的意義」的。

以車勒芮綏夫司基及爲其學徒的陀布洛留僕夫的見解看來，則藝術的重要的意義，是在再現生活，並對生活現象下判決。（註二）而且還不但只是文學評論家及藝術理論家如此看法。涅克拉梭夫（Nekrassov）就把自己的詩神（Muse）名爲「復讐與悲嘆」之神，而這不是偶然的事。在某篇詩中，市民向詩人像下面似地說道。

你詩人，天所選擇的人

永遠的真理的告知者呵！

不要相信沒有麵包的人

（註一）車勒芮綏夫司基全集第一卷，三三一一三四頁。

就不值得譜入你的豫言的絃罷！

不要以爲人們完全死絕了！

在人們的靈魂裏神依然生存着，

從信者的胸裏發出的悲歎

常常辨識着你的絃音！

做個市民罷委身於藝術

(註二)這見解就是培林斯基(Belinskij)在他晚年所完成的那見解之部分的重複與部分的發展。培林斯基在「對於一八四七年的俄國文學的見解」這論文中，這樣寫着……「社會的最高的最神聖的利益，是那平等地分配給所有各員的真實的幸福。向這幸福去的路——是認識，而藝術是在引導到這認識的一事上有着不劣於科學的力的，所以，科學和藝術都是同樣地必要的，不許科學代替藝術，也不許藝術代替科學。」但是，只有「在生活現象上」下了「判決」，藝術纔能使人們的認識發展起來，這樣，車勒內·綏夫司基的學位論文，是和培林斯基對於俄國文學的最後的見解相關聯的。

並且爲了近傍的人的幸福而活着呵——
把天才委置於

擁抱着萬物的「愛」的感情。

市民涅克拉梭夫，用了這個話表明了關於藝術問題的自己的意見了。即在造形藝術的領域，例如在繪畫上，當時的更良好的代表者，也抱着和這相同的意見。貝洛夫或克浪斯珂伊，是和涅克拉梭夫同樣，一邊服務於藝術，一邊「想做市民」的；他們和涅克拉梭夫同樣藉自己的作品「在生活現象上」下了「判決」了。（註二）

（註二）克浪斯珂伊從門敦寄給V·V·斯塔沙夫的，一八八四年四月三日發的信，就證明了他強烈地受了培林司基，戈果理，非陀特夫，伊凡諾夫，車勒芮綏夫司基，陀布洛留僕夫，貝洛夫等見解之影響。
「伊凡·尼古拉耶維奇·克浪斯珂伊，他的生活，書簡及藝術批評論文」一八八八年彼得堡版，四八七頁。但是在克浪斯珂伊的批評論文裏所看見的關於生活現象的判決，不必和車勒芮綏夫司基或陀布洛留僕夫的相比，就是和烏斯潘斯基（G. I. Uspensky）的相比，在那明確性上，也是分明地拙劣的東西——這有在這裏附記一下之必要。

關於藝術創造的問題站在和這相反的立場上的見解，在尼古拉時代的普式庚（Pushkin）那里，有着牠的有力的擁護者。「賤民」或「寄於詩人」的那樣的詩是當然什麼人都知道的。人民向詩人要求，要他用詩歌來改善社會的道德，但他給了輕蔑的說起來是粗暴的回答。

向那邊去罷平和的詩人

與你們有什麼關係呀？

趕快在淫亂中化石罷——

豎琴的聲音不使你們復活！

對於我的靈魂，你們真像墳墓一般討厭。

對於你們的愚昧與怨恨

到現在為止，有鞭笞

和牢獄，和斧鉞存在着——

在你們狂亂的奴隸，這些正十分够了！

關於詩人的工作的見解，由普式庚表現在下面的他常常重複着的言語中。——

也不是爲了生活的騷擾，

也不是爲了利慾與鬥爭，

我們是爲了靈感，

爲了甜美的辭句與祈禱而活着！

在這裏，我們就在我們的面前，於最明快的公式之中，看見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了。

六十年代的文學運動的反對者，那樣喜歡引用普式庚，也決不是沒有根據的。

這二個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場上的關於藝術問題的見解之中，應該承認那一個是正當的呢？

在着手這問題的解決之前，必須先明白這問題不應這樣設立。關於這問題，也和對於別的和這類似的問題同樣，不可從「應當做」的觀點來看牠。倘若在當時的時代裏的當時的藝術家迴避着「生活的騷擾與鬥爭」而在別的時代裏却相反，向着鬥爭，也

向着和鬥爭有必然的關係的騷擾，渴望似地突進着，那麼，這決不是因為外部的人們會對他們，在相異的時代裏課了相異的義務（不可不做的）的緣故，却是因為，在某一社會條件之下有某一精神支配着他們，而在別的條件之下就有別一精神支配着他們的緣故。就是，對於事物的正確的態度，是要求我們不要從「應當做什麼」的觀點，却要從「以前存在着什麼，現在又存在着什麼」的觀點來看。因此，我們把問題像下面一樣地安置罷——

使在藝術家及對於藝術的創造有着直接的興趣的人們之間，發生爲藝術而藝術的傾向，並且使這傾向強大起來的，那社會條件之中，何者是更重要的？

倘若我們能夠接近這問題的解決，則那時候，解決和這問題有密接關係，有同樣興趣的下面的問題，也會易容起來罷。

使在藝術家及對於藝術的創造有着直接的興趣的人們之間，發生對於藝術的所謂功利的見解，換言之，就是想在藝術作品上附加「關於生活現象的判決的意義」的。

傾向並且使這傾向強大起來的社會條件中，何者是更重要的？

這二個問題的第一個，使我們不得不再想起普式庚來。

就是他，也會有不擁護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的時代。他會有不迴避鬥爭，反而向牠突進的時代。亞力山大一世的時代就是這樣的。那時他不以爲「人民」是應該以鞭笞或牢獄或斧鉞滿足的了。反之，他懷着憤怒在那時自己的頌詩「自由」中叫道——

唉唉，無論看什麼地方，

什麼地方都是鞭笞，什麼地方都是鐵，

法律的苛酷的恥辱，

束縛的無力的眼淚，

什麼地方都在偏見的濃霧中

不正的權力……云云。

但其後他的精神根本地變了。在尼古拉一世的時代裏，他獲得了爲藝術而藝術的

原理。在他的精神中的這個大變動，到底因什麼而起的呢？

尼古拉一世登台的初頭，是以那十一月十四日的破綻（即一八二五年所謂十二月黨反叛的失敗——原譯者）而有名的，這件事正和對於我們的「社會」將來的發展同樣，對於普式庚的個人的命運也給了大大的影響。和「十二月黨」的敗北同時，在當時的「社會」上的最有教養的前衛的代表者，都離退了舞台了。結果，這不能不使那道德的知識的水平，顯著地低下了。海爾岑（Herzen）寫道：『我雖然很年輕，但我記得在尼古拉登台的同時，上層社會是怎樣顯明地頹廢着，腐敗着，變成爲盲從的了。亞力山大時代的那種貴族式的獨立，近衛隊式的剛毅，是和一八二六年一起消滅得無影無跡了。』在敏感的聰明的人，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裏是苦痛的。『在周圍是蔽，沈默，——同一海爾岑在別的論文中寫道——一切都是沒有反應，沒有人氣，沒有希望，並且極端地遲鈍，愚蠢，縮小着了。那尋求同志的視線，倘不是從僕的威嚇，就被以驚愕來接受，人們是從他背過身去，或者給他以污辱了。』在相當於寫了詩「賤民」及「寄於詩人」的時代的普式庚的

書信中，就可以不斷地遇見對於在我們的二都市裏的倦怠與庸俗的不平。但是他不但在圍繞着他的那社會的庸俗裏苦惱着而已，他和「統治階級」的關係，也毒害了他很多的血。

在我們之間有這樣的一個實在可感動的傳說流佈着——一八二六年尼古拉一世可感謝地「寬赦」了普式庚的政治上的「稚氣的過失」，甚至成爲他的可感謝的保護者了。但事實却完全不是這樣。尼古拉和在這種事業上爲他的一隻右腕的那憲兵隊長阿·哈·屏坑特勒夫，却一點也不「寬赦」普式庚，而且對於普式庚的「保護」，這在普式庚是無限的，不可認耐的輕蔑。一八二七年屏坑特勒夫向尼古拉訴說道：「普式庚和我會晤了以後，曾在英國俱樂部裏歡樂地說及陛下，並且還強制和他在一起吃喝的人爲陛下的健康而乾杯呢。總之，他是一個正真的笨漢，倘若指導他的筆和詞藻而得成功，那是有益的。」這最後的一句話，將加給普式庚的那「保護」的秘密，展開給我們看了。這是想把他造成爲一個現存秩序的讚美者。尼古拉和屏坑特勒夫，是以馴順普

式庚以前的強暴的詩神，使其走上了官家的道義的路爲目的的。當普式庚死後，元帥巴斯凱維奇送信給尼古拉，寫了『普式庚當作一個文學者是可痛惜的』這話的時候，尼古拉是這樣回答了——『你的意見，我也同感。關於他（即關於普式庚，並不是關於意見，——蒲力汗諾夫註）其中覺得可痛惜者，可以說不在過去而在未來吧。』（註一）這意思就是說，這個不可忘記的皇帝在評價這個死去了的詩人的時候，並不看他在短短的生涯中寫留下來的那偉大，乃看他將來將會在相當的警察的監督與指導之下寫出的那東西的。尼古拉想從他那兒期待着像庫珂里尼克的戲曲「至尊的手救祖國」似的那種「愛國的」作品，連非常優秀的宮廷詩人，那不是此世的歌人V·A·庫珂夫斯基似的人，都努力想把對於道義的尊敬教給普式庚。在一八二六年四月十二日發的信中，他說道——『我國的青年（即不斷地成熟起來的一代人），因爲那不給予生活

（註一）西車戈雷夫的「普式庚」彼得堡一九一二年版，三五七頁。